

河山有誓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冯贤亮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河山有誓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冯贤亮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山有誓: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冯贤亮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5
ISBN 978-7-309-14265-5

I. ①河... II. ①冯... III. ①文化史-中国-明清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8.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9802 号

河山有誓: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生活世界

冯贤亮 著

责任编辑/李又顺 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0.5 字数 328 千

201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4265-5/K · 695

定价: 6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重探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政治演替	/ 1
士人与文人	/ 1
文人士大夫的意义	/ 5
晚明印象	/ 8
17 世纪的危机	/ 15
清初的乱与治	/ 22
生活世界的变化	/ 26
前朝梦忆与归入新朝	/ 30
二、青词宰相：顾鼎臣的家庭生活与地方社会	/ 35
昆山顾鼎臣	/ 35
家庭生计	/ 44
家族控制	/ 48
读书与养生	/ 57
社会变化与地方关怀	/ 64
地方事务及公益活动	/ 73
衣冠阀阅之家的评述	/ 78
三、布衣袁仁：地方知识人的生活世界	/ 81
袁仁的家世	/ 81
处世态度与城居生活的安排	/ 85



姻亲关系中的核心	/ 92
官场关系与社会地位的呈现	/ 100
士人交游的世界	/ 104
布衣生活中的家国情怀	/ 113
四、乡区生活：乡绅控制与农村社会	/ 118
县域社会的问题	/ 118
从陈于王到陈龙正	/ 124
胥五区的社会实态	/ 130
家族生活的安排	/ 137
乡区行政与吏治问题	/ 142
国计讨论中的地方责任	/ 144
北运与均役问题	/ 148
乡区救济及其地缘性	/ 152
秩序稳定和治安问题	/ 157
非宗族的乡绅社会	/ 160
五、断裂的逸乐：围绕青楼的生活世界	/ 165
由青楼说起	/ 165
文人忆述中的逸乐世界	/ 168
笔记小说中的现实描叙	/ 178
苏州山塘的休闲空间	/ 185
社会风尚的刻画	/ 193
生活与观念	/ 204
才子佳人及其时代变迁	/ 209
六、董含与三冈：地方士人的生活变动	/ 220
明清鼎革之际的士人生活	/ 220
三冈董氏	/ 223
乡里的生活世界	/ 230
《三冈识略》的文本意义	/ 236



地方的场境与秩序问题	/ 243
社会交游与情怀	/ 246
山川犹是而风俗非故	/ 252
七、王翬的登场：江南画坛的场境与王朝统治的影响	/ 255
以丹青闻世的常熟王氏	/ 255
从二王到六大家	/ 257
王翬的登场	/ 263
“不生不熟”的王原祁	/ 271
黄鼎与杨晋	/ 273
画外别有事在	/ 276
八、赋役故事：一个松江秀才的经历和记忆	/ 282
被奉入报功祠中的秀才	/ 282
曹家驹与地方豪绅	/ 285
关于《说梦》	/ 289
漕运与赋役问题“三大事”的回忆	/ 293
顺治年间的变革与旷银问题	/ 300
均田均役的评述	/ 304
地方归入新朝的漫长进程	/ 311
后记	/ 316

一、重探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与政治演替

士人与文人

“画舫笙歌顷刻过，只有菱歌，不拾人间唾。口既如簧眼似簸，几回看得兴亡破。”^①

这是明末世家子张岱所撰《隔浦菱歌》的上阕。经历了王朝更迭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张岱这个最多只能归入“士人”阶层的纨绔子弟，才高命蹇，在劳碌半生后，表达出他生活中的寥落况味与精神世界。

依照传统社会有关四大阶层“士农工商”的论说，士一直为四民之首，与农、工、商一样，皆属“国之本”。^② 在精神与价值观方面，“海内士人共为一家”，是个共同体，当然晚至明代万历年间，已有“纲维之务破，不顾主之孤立于上”的不良情形的批评，且已非一日。^③ 不过，严格地说来，在明清时期文献的记述中，占据着知识阶层大多数的“士人”，是尚未进阶至进士的知识人群体，与传统所谓四民之首的“士”，在意涵上存在差异。

明清士人在奋身举业仕途的道路上，有“士人立身，莫高于无求”的言说，就像在仕途中，“当官尤先于风节”^④，都有很高的期许。所谓“求”，无非是为求捷径或便利，而四处关说请托，一如被欲望驱使的当官者一样，缺乏节操。这在正人君子看来，绝对是不可取的。

在士人们眼中，“乡科”是进身的第一步。有了举人的资格，才有进一步攀升至进士或者转入理想的宦途的可能。但实际上，在士人生活中，“或作气势于乡

① [明]张岱：《琅嬛文集》卷六《隔浦菱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305页。

② [春秋]管仲：《管子》卷第二《乘马第五·经言五》，四部丛刊景宋本。

③ [明]安世凤：《墨林快事》卷八，“苏居常州帖”条（天启乙丑正月晦），清钞本。

④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四《时务·节俭训示浙江戊午新科》，崇祯刻本。



里,或借居间为生活”的各种表现^①,都有泛滥之态。

不论是否有在乡里装气势还是为生活帮人搞关系,主流士人的生活核心,仍在举业的讲习训练。查铎指出,“今世士人,惟以词章日督其子,为青紫计,闻讲学之名,辄訾以为迂”^②。或者如明末清初昆山陈瑚所讲的那样:“有明当隆、万之季,天下治平,其时之文人墨士习帖括之陈言,以博科名而肥妻子,孔、孟之书委诸口耳而已。”^③在以举业学习为正常心态或者只是利用科举为进身之途的人看来,热衷于讲学论道的活动,是迂腐的表现。毕竟当时的所谓文人墨士,身处晚明的“太平盛世”,读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科第而使妻、子生活优渥。

曾任刑科左给事中、山西参议、广西副使等职的查铎,主要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已是“讲学”盛行的时代,他本人也好“讲学”,所以士人生活中对于讲学的排斥与批评,他保持了不同的看法。毕竟,晚明地方上的讲学活动,已成盛行之势。对于士人的文化活动存在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有人认为:“今人说学,不必讲学,何可不讲?只如今士人习举业,终日诵读作文,乃场中时艺论策,何尝不是讲学论道,必称孔孟诸子而下不屑也。”^④讲学活动与士人举业的习学,其实并不矛盾,科考的核心内容“时艺论策”,也属一般而言的“讲学论道”的范畴。

很多人又清楚地意识到,年轻的士人好为诗文,文人气太重,必然对举业有所妨害。对普通人来说,“作诗须称地位”^⑤。所谓要有相称的“地位”,在注重科举的人士看来,就是在举业上成功并获得仕途的机会后,作诗或好为古文辞,才会被认为是当然之事,而且更显风雅。

洪武时期担任过户部尚书的赵世卿,曾指出:“士人操行,廉耻为先;国家劝惩,风节是重。”^⑥后来,乌程县南浔镇人朱国祯(1558—1632)进一步表示,“士人自束发咕哔以来”,就应懂得“以直言敢谏为贤”。^⑦他们所论的,都是士人立身处世的品格,对此他们有较高的要求。

①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四《同安县志·人物志》,“乡科”条。

② [明]查铎:《查先生闻道集》卷七《文类·贺杜孺人八十寿叙》,光绪十六年泾川查氏济阳家塾刻本。

③ [清]陈瑚:《确庵文稿》卷之古文《读藏书日记序》,康熙间毛氏汲古阁刻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8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350页。

④ [明]陈师:《禅寄笔谈》卷一《理学》,万历二十一年自刻本。

⑤ [清]曹庭栋:《永字溪庄识略》卷六《识阅历》,第402页。

⑥ [明]赵世卿:《司农奏议》卷十三《奏辩人言疏》,崇祯七年赵浚初刻本。

⑦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六,“黄叔度二诬辨”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0页。



实际上,据万历时期陈师的观察:“今士人结交,促膝相与,日酒食征逐,指水旌信,以为平生金石交,一旦临利害,远避不暇,甚或挤而排之,朝欢暮仇者不少也。”^①士生活中趋利避害等不良风习,其实具有广泛性。当然稍好的情形,就如隆庆五年进士、曾因弹劾张居正而被削籍的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所言:“今世士人,一或坎壈于时,往往矫迹栖遁,希恬退之名,一旦徼时之幸,遂不胜其酣豢沉湎,昔山林之托,惟恐其影响之,或及视以为不祥而去之矣。”^②运气不好时就比较矫情,就想在社会上博得“恬退”的美誉,可一旦获得荣升的机会,昔日故作姿态而表现的隐逸孤傲,就显得不合时宜,而且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士人荣辱感受的这类表现,又多少有些不堪。

当然,士人作为社会中坚,应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与担纲者。但社会处境与活动毕竟会因时代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明代中期以来,仕途壅塞情形变得相当严重,大多数士人已成了在仕途上完全没有机会的游士,人生的很多时光,都浪掷于无尽的科考途中。晚明汹涌的商业化浪潮对社会的全面促动,更影响了士人尝试转趋不同场域,纵身城市繁华,另创生命的意义。^③

清代著名文人包世臣(1775—1855)所谓“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为尤甚”的说法,在士人生活中又是很具代表性的,那种“经理私事与勾当公事并重而常相待”的态度,就因存了点“治生”为急的私念而来。^④而“士人一入宦途,便失本色”的现象^⑤,就成了有识之士的共同感受。未仕之时,支持士人长期的寒窗苦读,溺于科举之学,完全出于高功名的渴望。而一旦正式进入仕途为官,又将饱受刑名、法术、簿书、钱谷之类工作的困缚^⑥,读书时代的理想将大打折扣。

所以士人中可称作“君子”的,应当能够很好地平衡“不必仕”与“不必不仕”的问题,“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极有分量和哲理的认识。^⑦

总体上,士人在整个知识阶层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是所有以“进士”为目标的读书人,包括举人和州县学的生员,也包括医者。^⑧被认为士人的,虽然连知县

① [明]陈师:《禅寄笔谈》卷四《交与》,万历二十一年自刻本。

② [明]赵用贤:《松石斋集》文集卷八《灵洞山房诗集叙》,万历四十六年赵琦美等刻本。

③ 王鸿泰:《浮游群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10—211页。

④ [清]包世臣:《小倦游阁集》卷九正集九文五《答姚伯山书》,清小倦游阁钞本。

⑤ 杨钟羲:《雪桥诗话》卷十二,民国求恕斋丛书本。

⑥ [清]张孝时:《筠心堂存稿》卷首,陶文瀾《筠心堂集序》(咸丰四年春三月),光绪五年刻本。

⑦ [清]袁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不必仕不必不仕”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

⑧ [明]边贡:《华泉集》卷十一《文集·荅周北渚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样的小父母官,有时也不大肯“屈己去见”,若是见了会被认为是件“异事”^①,但在身份法层面,他们依然享有减免刑罚的优待。在社会上,士人与乡绅一样,属于领导性质的阶层。^②

士人在完成基本的知识训练,即具备阅读与写作能力后,知识活动或文化认同开始出现了歧异,在举业范围外,崇尚“博古”“古文词”等,包蕴文人意识的由来,是文人文化的发展根源。^③

其实,文人的概念相对宽泛,可以泛指知识分子,重点在诗赋或古文辞方面的修养与追求,当然也兼重艺术技能。

“好古文词”被文人们视为“不朽之业”。在皇甫汈为中山武宁王七世孙徐京所撰的墓志铭中,所述徐京的经历,就是一个放弃科考后专力于“古文词”等文人能事的典型:“后累科不第,辄弃去曰:‘此殆非不朽业,奚足困壮夫哉?’遂拟古文词,特闲诗赋,不窥家园者十年矣。”^④

再如,出身于嘉善名族的曹庭栋(1700—1785),从有志于显扬、屡败屡考的少年时代,到中年以后绝意仕进,日常醉心于弹琴赋诗、写兰石、摹古篆隶,以抒发闲寂之抱,“得失两忘,荣辱弗及”,成了比较纯粹的文人。^⑤

生活于康熙至乾隆时期的昆山名士龚炜,少时即能诗,在他比较得意的赋雪景的诗中,有“收纶渔父归舟晚,迷径樵人行路斜”一句,被誉为“仙才”。但他这种学诗之好,因举业的压力而被迫抑制,“未敢露此意”。^⑥

纯粹追求文人能事的,会被认为脱离社会,不是迂就是庸,是无用之人。或者如顾炎武引宋人刘摯教训子孙的名言,所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这样的文人,是为顾炎武所厌恶的。顾氏还指出:“唐、宋以下,何文人之多也!固有不识经术,不通古今,而自命为文人者矣。”^⑦

总的来说,文人的生活世界中,多与科举道路的取舍相关联。有“身份”的文

①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二十九卷《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628页。

② [日]高桥芳郎:《宋至清代身分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1、144页。

③ 王鸿泰:《迷路的诗——明代士人的习诗情缘与人生选择》,《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5年第50期,第6页。

④ [明]皇甫汈:《皇甫司勋集》卷五十四《志铭·徐隐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清]曹庭栋:《永宇溪庄识略》卷三《识杂文》,乾隆三十年刻、增修本,收入《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2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版,第383页。

⑥ [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一,“学诗大不易”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页。

⑦ [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一,“文人之多”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849页。



人，其威权的获得，主要来自文化、社会与政治，而非经济。

文人士大夫的意义

钱穆指出：“宋、明以下之社会，与隋、唐以前不同。世族门第消灭，社会间日趋于平等，而散漫无组织。社会一切公共事业，均须有主持领导之人。若读书人不管社会事，专务应科举、做官、谋身家富贵，则政治社会事业，势必日趋腐败。其所以犹能支撑造成小康之局者，正惟赖此辈讲学之人来做一个中坚。”^①以知识人为核心建构的中坚力量，是继续一个王朝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论及士人或文人，自然关乎绅士概念的论说。一般的绅士概念，较具局限性。而且传统时代习用的“绅士”，意涵比较笼统。按照清人的定义，就是包括了举监生员及告休家居之大小官员，也是地方官员最应熟悉的社会有力阶层。其中公正廉明的，是所谓的“公正绅士”。^②

在根岸佶早期有关“耆老绅士”阶层的研究中，细心观察到清初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的定义^③，发现笼统的“士绅”概念与“乡绅”的定义，有不少差异。

黄六鸿认为，所谓“本地乡绅”就是指那些“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④，前提条件当然是要有功名。这是有关“乡绅”比较严格的定义，符合明清时代有关“乡绅”身份的言说。至于明清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乡官”，则与乡绅是同义词。^⑤这一群体与乡里的结合，是非常深的。即便是在中央官场显达之人，也未因此就成了“首都人”，仍把根据地置于乡里，在乡里增殖其资产。即使是现任官吏，在任期期满后就要退下来，而在得到新的官职之前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期间就常常在乡里生活。而关于官僚阶层，不查一下其出身地，就难于理解其行动。而年老隐退的，更以乡里生活为常。这种乡居之官，或在广大乡里所见的官僚，也称“乡宦”。^⑥

包容范围较广的绅士，本村正一认为，应该包括现任官，退任官，候补官，举

①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812页。

② [清]延昌：《知府须知》卷四《到任事宜》，“公正绅士”条，清钞本。

③ [日]根岸佶：《中国社会に於ける指导层——耆老绅士の研究》，平和书房1947年版。

④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四《莅任部三·待绅士》，光绪十九年文昌会馆刻本。

⑤ [日]酒井忠夫：《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7—88、95页。

⑥ [日]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和民众》，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明清”，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9—265页。



人、秀才等未出仕者和有官衔者这五类人。^① 天野元之助的定义更有意思,认为士绅是指退休在野的官僚及其子孙。^② 萧公权则将现任官等有官衔的归为“绅”类,举人、监生等有功名而未出仕者归为“士”类^③,统称“绅士”。傅衣凌认为,在外地任官但仍对故乡基层社会产生影响的官僚、地方上无功名而有权势者,都可纳入士绅或“准士绅”的范围内。^④

而笼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自然可以包容上述各阶层,在知识、权力与社会声望三个方面,可以综合指称那些已出仕与未出仕的读书人,可以分成“大夫”与“士”两大类。这种广义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尤以“官僚政治精英”阶层最具影响力。^⑤

以这一群体最密集的江南地区为例,他们的出身,大多是所谓的“耕读之家”,其次有少数来自都市富商阶层,第三则来自更少的都市平民家庭(可能是基层教师,小生意经营者,地方官衙的胥吏,或者依赖乡村富室的赘婿身份,获得向上攀升、立身出世的支撑点)。^⑥

成化十一年进士、由翰林院进身至内阁大学士的苏州人王鏊(1450—1524)认为,社会越发展,官绅队伍越显繁杂,在这样的趋势下,“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因而也很难产生古代的所谓“循吏”。^⑦ 在晚明以来关于地方社会风气败坏的批评中,就涉及地方官员与居乡士大夫这两个关键性的群体。前者“食君之禄,居人之上”,本应该“顾念职守,承宣德意,为百姓分忧”,然而常有“日务送迎奔走,取办簿书,谄媚上官,以求荐举、图升迁”的情形,自然对于吏弊民隐“恬不经意”,对朝廷的政策与要求常有怠慢之举。而作为“乡邦之领袖”的后者,是属于“挂名仕籍”、受国家恩宠的一个群体,更宜表率齐民、奉公守法,却与那些贪图利禄的地方官员们一样,“瘠人肥己,效尤成风,坐享田租之利,而使无田小民

① [日]本村正一:《清代社会に於ける紳士の存在》,《史淵》1940年第24期,第61—78页。

② [日]天野元之助:《支那农业经济论》,东京:改造社1940年版,第307页。

③ 萧公权 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

④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三期,第3页;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一期,第12页。

⑤ 陈宝良:《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二期,第89页。

⑥ [日]滨岛敦俊:《从〈放生河约〉看明代后期江南士大夫家族》,《明代研究》2011年第十七期,第91—119页。

⑦ [明]王鏊:《震泽长语》卷上《官制》,嘉庆十三年张海鹏辑、借月山房汇钞丛书本。



代其包赔税粮”，倘遇官府清查，也敢妄行阻挠，任私情而昧天理。^①

所以，如果地方绅士不持公论，对地方社会就会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万历八年进士、吴县人伍袁萃就说：“君子不持公论，将使小人持之乎？荐绅先生不持公论，将使市井细民持之乎？”^②社会的重心在“君子”，在“荐绅先生”。只有这个绅士阶层能真正主持公论，社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小民才能获得更多的依靠。嘉定绅士侯峒曾以其地方社会生活的丰富经验，认为“为民请命”是那些“贤豪长者之业”，而“导扬圣明，宣悟闾里”则为“乡大夫之事”。^③康熙初期仍然在世的吴江人陆文衡，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在他对晚明地方公议的评说中，已透露出对彼时地方绅士关心社会公益、评议行政利弊而又能被官府所敬重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的怀念。他说：“往时缙绅有公会雅集，团坐一处，讲求时事得失，咨询地方利弊，凡衙门积蠹大恶，皆耳而目之，谒当事，侃侃指陈，或公函条议，当事虚心采纳，以故上下之情通而梓里蒙福，蠹恶亦有所畏惮而不敢逞。”^④

绅士们关心地方公事，重视地方利弊的解决策略，通过公会雅集，或公函官府，使地方社会更形趋利避害。但如果采取过激或暴力的手段，威慑地方有司，就会产生如明末浙江乌程县的生员，“动持吏短长者”而使地方官“凛凛忧炙手”的那般情形^⑤，在地方社会生活中不再罕见。

上述这些评说，当然并不能涵括所有地方官员与绅士的面貌，也不否认在一个“国家化”程度很高的地域中（特别是江南）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所怀持较强的忠诚度^⑥，但存在于地方官与乡居文人士大夫之间互相牵制的弹性关系，确实可以使地方社会趋向良性发展。

士人的文化、生活、政治与社会活动参与，面向多样，内容复杂。即如最繁荣的江南地区，经济上发展的奇迹与城市居民消费及其生活空间的革命性变化^⑦，

① [明]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卷二《恳乞天恩饬典宪、拯民命以振举军国大计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万历至顺治顾氏家刻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5册，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版，第292—293页。

② [明]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八，明万历年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190页。

③ [明]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十《壬午复折奏疏序》，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页12a。

④ [清]陆文衡：《音庵随笔》卷四《风俗》，光绪二十三年吴江陆同寿刻本，台湾广文书局1969年影印版。

⑤ 崇祯《乌程县志》卷四《风俗》，崇祯十年刻本。

⑥ 参[美]邓尔麟：《嘉定忠臣——17世纪中国士大夫之统治与社会变迁》，宋华丽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⑦ 详参巫仁恕：《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



都是由文人士大夫记录。所以,除了思想史、政治史或学术史的角度,还需要从他们的生活空间(城市、园林、山水)、诗酒流连等层面,充实对于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①

在晚明清初,士人生活中除了休闲生活的营造、闲雅逸乐的追求与文人文化的涵养外,因身处晚明社会的复杂变局,旋即遭遇明清两代的政权更替,生活中也时刻存在着某种紧张感,甚至更多的是焦虑。不同生活领域或文化处境的士人,从祖父辈到子孙的世代,感受更是不同。如何在家国大义与生活的维持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或者作有益于个人命运的抉择,在面临王朝更替的氛围中,对地方精英分子来说,又是困难良多。

晚明印象

在历史上,明王朝被视为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明代的出现了文化的发展、国土的开拓,在其最后阶段,内部相对稳定,光辉灿烂的传统中国文化越来越成熟,人口有稳步的增长,识字的人数大量增加,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城市水陆交通体系逐渐充实,东南沿海诸省日益变得重要。这个时代的明代社会,有着无穷的活力。^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正德朝前后,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许多变异,如董其昌所谓的时文之变与理学之变,都是时代变化的趋势所致。^③这种分水岭式的变化感觉,到嘉靖朝就更为明晰,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政治,都有着明显转折的感觉。^④时人对于当时社会的变迁与风俗的奢化,有很深刻的体认: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纓帽绸鞋,纱裙细袴。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汨汨浸淫,靡焉弗振。甚至娇

① 李孝悌:《士大夫的逸乐——王士禛在扬州(1660—1665)》,收入氏著《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② [美]年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导言”,张书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③ 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

④ 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页。



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滥觞至此极哉！然且务本者日消，逐末者日盛，游食者不事生产。呼卢者相率成风，乐放肆，而寡积蓄，营目前而忘身后。是以温饱之户，产无百金，奇美之家，延不再世。此民生之所以日困，而风俗之所以日偷也。^①

就官绅队伍的风节而论，总体上在嘉靖以前，崇尚循良，重视名节，几有两汉遗风；嘉靖以后，文人士大夫在为官之际，公然比较官缺的肥瘠，假使为官一任而垂囊而返，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的话，会被取笑，认为是“无能”的表现。^②因此也就有万历八年进士、吴县人伍袁萃所感叹的：“今天下人惟利是趋，视仁义若土芥，不复顾惜。”^③

明末清初长期流寓江南的唐甄（1630—1704）指出：“吴地胜天下，典籍之所聚也，显名之所出也，四方士大夫之所游也。”^④唐甄强调的，是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最重要生活空间，是以苏州为中心的。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生活的奢靡化令人惊叹。

嘉靖十四年进士、杭州府仁和县人张瀚（1510—1593）以其生活时代的感受，表示那时的“民间风俗”，早已是“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文人雅士们推崇的精巧细玩，达到了“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耕织”的境地。^⑤但像谢肇淛（1567—1624）这样的绅士则表示，在物质享受与休闲生活追求上，那种“田园粗足，丘壑可怡；水侣鱼虾，山友麋鹿；耕云钓雪，诵月吟花；同调之友，两两相命；食牛之儿，戏着膝间”的生活状态，已足以令人向往而陶醉，不是寻常的富贵生活可比的。^⑥

在一些重要的岁时节庆狂欢活动期间，晚明地方上的生活，足称繁盛。张岱认为，在太湖平原地区最为繁华壮阔的苏州，四时游客从无寂寥。仅虎丘一地，除了当地人，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

① 康熙《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康熙三年刻本。

② 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③ 〔明〕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三，明万历间刻本，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7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版，第165页。

④ 〔清〕唐甄：《潜书》上篇上《无助》，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页。

⑤ 〔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页。

⑥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70页。



子、变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僮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① 很多士人的休闲生活中，还有所谓“喜谈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说者，游心于风月之乡”的追求^②，这些都是他们品味与情感的表达方式。

唐甄、张瀚、张岱等人所论的内容，基本上都处晚明时期。不管怎样，那种生活景况，仍然是令人向往的。文人雅士们的生活，很有些谢肇淛所概括的，极力追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厌粱肉，身薄纨绮，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第之上”这样一种“闲”的境界，也是世人所谓“名利不如闲”的处世态度。^③ 文人士大夫大多喜欢城居。嘉兴地方的上层文人，普遍拥有两处以上居所。至于在外地建造别墅，也十分流行，像沈思孝的溪山堂就建在吴兴。嘉兴士绅最喜欢的大城市是杭州。李日华的老师冯梦禎、好友谭昌言，都寓居杭州。^④

当然明代中期以来，城市中的文艺社交已成普遍现象，更契合文人们的精神需求。繁多的城市聚会中，如崇祯十六年进士黄淳耀（1605—1645）所概括的，有文会、酒会、游会、谈会、交会五大类，并以文会最似“正业”。^⑤ 这样的社会网络，有着塑造大部分人生活方式的意义，除了在某些特殊时期，国家只能影响这些网络，而不可能重塑这些网络。^⑥

在这些耽于承平之世的社会交游活动中，士大夫以儒雅相尚，像评书、品画、论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堪称无一不精。骚人墨客们，也都工于鉴别、善于品题，可谓“玉敦珠盘，辉映坛坫”^⑦。

从“治生”的角度考虑，以笔砚谋食的士人，会根据市场消费情况来改变创作风格，士商关系空前密切。士商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互惠互利，除此之外多存竞争性。士人阶层不可能漠视商人阶层在文化上压倒他们的优势地位，所以在推动奢侈消费和文化消费方面，强化品位，标榜自我，以期建立一道区分雅、俗的界限。所以才会有沈德符所谓的，玩好之物滥于江南好事缙绅，并很快

① [明]张岱：《陶庵梦忆》卷五，“虎丘中秋夜”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6—47页。

② [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③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第374页。

④ 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0页。

⑤ 王鸿泰：《浮游群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收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都市繁华——一千五百年来的东亚城市生活史》，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04页。

⑥ [加拿大]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陈时龙译，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8页。

⑦ [明]文震亨著、陈植校注：《长物志校注》，伍绍棠“跋”（同治十三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



为商人们所仿效实践。^①虽然早在元明之际,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批具有隐逸色彩的文人社群,但直到明代中后期,社会上才更为明确地涌现一批有别于学士大夫而别具普遍性社会意义的“文人”,他们致力于美感生活的经营,形成了一套“雅”文化。这种以赏玩为主旨的文化的发展,则一直处在市场化、商品化力量的包围下,文化内容的拓宽,与市场机能交互作用,推动了社会文化的整体变化。^②

至于地方官场之中,就像做过长兴知县的归有光所谓的,那些在财赋乐土江南为官为吏的,“以期会鞭笞,集赋税”,号称庶政严切;同时因吏治烦剧,衙门杂务多是“以意穿凿”,专求声名政绩,号称“振举”。^③万历二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文选员外郎的赵南星,在万历十七年十一月上疏,直言当时官员政治生活中的不少弊害^④,因而触犯了很多人的忌讳。赵南星认为,当时社会已是“世道日颓,人皆趋时以苟富贵,以奔竞为常事,以徇私为无伤,以巽懦为老成,以模棱为妙用,彼此相欺,无所愧畏”,就是有心忠于朝廷也“孤力难施”。^⑤

所以明末清初人钱澄之就以江南人为例,批评文人士大夫们急于进取,务虚名,尚奔竞,而且重视门户、私交之类,从而形成的关系网络。长兴人、万历十四年进士丁元荐将上述情况概括为以“势”为党、以“情”为党与以“利”为党三大类。^⑥

《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产生的一部小说,它所描写的主要是万历中期的社会情形,内容充斥着市井社会的侈靡鄙俚的生活描述,甚至还隐含着政治斗争的言说,指斥“时事”。而且,也只有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社会,才能产生《金瓶梅》这样一部作品。^⑦

从宏观上看,明朝的政治,从大明祖制奠立以来,虽然久苦因循,但至晚从弘治朝后期的16世纪以来,与世界的大变动基本相应和。这个时期,也就是人或

① 叶康宁:《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73—174页。

② 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新史学》2006年第四期,第73—141页。

③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九《送太仓守熊侯之任光州序》、卷十《送许子云之任分宜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2、236页。

④ [明]吴亮:《万历疏钞》卷六《国是类》,万历三十七年刻本。

⑤ [明]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十九《总宪疏·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⑥ 陈宝良:《明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家族及其关系网络》,《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二期,第88—94页。

⑦ 吴晗:《〈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1931年)、《〈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934年),收入北京市历史学会主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4、334—370页。